

論官話方言研究中的幾個問題*

丁 邦 新

本文第一節說明有關北方官話研究的歷史背景，特別指出十五世紀以後有一系列的韓國資料值得重視。

第二節討論官話方言的分區問題，利用聲韻條件將官話先分爲北方官話、晉語、下江官話、西南官話及楚語，再將北方官話分爲六區，下江官話分爲四區，西南官話也分爲四區。

第三節討論聲母演變的現象。首先發現歷史資料中官話全濁塞音除一般平聲變送氣，仄聲變不送氣以外，還有全部變送氣清塞音及全部變不送氣清塞音的兩種類型。前者是爲客家話的來源在北方官話中找到早期的證據；後者可以解釋漢語的早期官話和八巴思字對音的難題。其次探討官話顎化音產生的時代，及其他聲母演變的概況。

第四節討論韻尾合併、消失和產生的問題。首先說明四川方言鼻音韻尾合併的方向，認爲演變的先後受元音的影響很大。並指出雲南和四川兩地演變的步調都不相同，要作大方言區普遍的觀察，不能只舉少數方言點爲例。其次指出鼻音韻尾的消失，經過鼻化音的階段，有時以偏前的元音爲演變條件，推知給梗攝字擬測舌面鼻音的辦法未必可取。再其次說明新鼻音韻尾產生的例子。

第五節說明官話方言聲調的分合及古調值擬測的理論，指出「變調即原調」的可能。最後爲結語，說明許多猶待解決的問題。

壹、概 說

官話是漢語方言中最大的一支，人口最多，¹ 通行的區域也最大。一向大分爲北方官話，下江官話和西南官話三支。² 近年來對於分區的問題頗有一些討論，我（1982）也曾提出個人的看法，下文第二節再詳細說明。

從歷史背景來說，有關北方官話的方言材料最爲豐富。例如羅常培先生（1933）

* 本文爲七十五年元月十五日至十九日作者參加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主辦之國際會議時宣讀之論文，會議名稱爲 *Conference on the Languages and Dialects of China*，已譯成英文將在論文集中發表，經徵得論文集主編王士元教授之同意先將原稿在此刊印，特此致謝。此文曾請周法高先生及李壬癸、龔煌城兩兄惠閱，有所指正，併致謝忱。

1 據目前估計，約有六億人。

2 見李方桂先生文（Li 1973: 3），下江官話稱爲 *Eastern Mandarin*。最近的看法參見詹伯慧 1981 a、b，丁邦新 1982，李榮 1985 a、b。

研究的漢藏對音，代表八至十世紀唐五代的西北方音；周祖謨（1943）、李榮（1956）等人根據北宋邵雍（1011-1077）《皇極經世》書中的聲音倡和圖研究十一世紀河南洛陽的語音；龔煌城（1981）利用《番漢合時掌中珠》（1190）³裏的漢語和西夏語的對音資料，擬測十二世紀一種西北方音的聲母系統。鄭再發（T. F. Cheng 1985）根據《古今韻會舉要》（1297）、《蒙古字韻》（1308）和《中原音韻》（1324）討論十三、十四世紀早期官話的系統。有關《中原音韻》的研究有許多家，趙蔭棠（1936）、陸志韋（1946a）、董同龢先師（1951）、Stimson（1962、1966、1978）、薛鳳生（Hsuch 1976）、楊耐思（1981）和 Pulleyblank（1984）都有成系統的擬測。對於其中有問題的齊微、蕭豪兩個韻部的擬音，我（1981b）曾經利用當時的方言資料提出一點新的看法。

從十五世紀以後，跟北方官話有關的韻書如《韻略易通》（1442）、《西儒耳目資》（1625）、《韻略匯通》（1642）等都有人做分析性的研究，這裏不一一贅引。但是有一系列的韓國資料值得特別重視：韓國朝鮮（1392-1896）王朝在 1393 年設立司譯院，使用兩種學習漢語的教材，《老乞大》和《朴通事》。這兩本書大概寫成於 1346-1423 之間，當時韓國還沒有發明他們的拼音文字。⁴等到 1443 年，世宗創制「訓民正音」之後，一方面命申叔舟和成三問編成《東國正韻》（1447），記錄十五世紀朝鮮漢字音的標準音，也編纂《洪武正韻譯訓》（1455）作為學習漢語標準音之用；另一方面，到十六世紀，崔世珍（1473?-1542）就用訓民正音給《老乞大、朴通事》兩書注音，並譯為韓文，成為《翻譯老乞大》和《翻譯朴通事》。注音的方法是給每一漢字加注左右兩種音。左側音是洪武正韻譯訓的俗音，代表十五世紀申叔舟所記的中國北方音，右側音則是崔世珍所接觸到的十六世紀的中國北方音，稱為「今俗音」。⁵

老朴兩書差不多每隔一百多年就有新的「今俗音」出現，留給我們重要的資料來

3 此書為西夏人骨勒茂才所著。

4 參見丁邦新 1978。

5 1517年崔世珍也在《四聲通解》一書裏記錄三種字音，「正音」和「俗音」照抄自《洪武正韻譯訓》，「今俗音」就是十六世紀的中國北方音。

推測十六至十八世紀中國北方音演變的情況。以中文撰寫論著的主要研究者有姜信沅（1980）、崔玲愛（1975）和康寔鎮（1985）。現在根據康氏的研究（1985：40）把老朴兩書相關的資料列表如下：

書名	時代	作者	注音情形及其他
1. 老乞大、朴通事	1346—1423	不詳	無注音
2. 翻譯老乞大、 翻譯朴通事、 老朴集覽	1517 之前	崔世珍	左側爲十五世紀俗音， 右側爲十六世紀今俗音， 有聲調旁點。
3. 老乞大諺解、 朴通事諺解	1670 1677	邊 暹 朴世華	有新注音，無調號。
4. 舊刊老乞大諺解	1745	卞 煙	有新注音，無調號， 與前兩書相同。
5. 老乞大新釋 朴通事新釋	1761 1765	邊 憲 等 金 昌 祚	無注音，但修改語法、 詞彙。
6. 朴通事新釋諺解	1765	金 昌 祚	有新注音，無調號。
7. 重刊老乞大 重刊老乞大諺解	1795 1795	李 洙 等 不詳	語法詞彙微有不同。 有新注音，無調號。

從平面的方言調查來說，有關西南官話的資料最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印行的《湖北方言調查報告》（趙元任等 1948）、《雲南方言調查報告》（楊時逢 1969）、《四川方言調查報告》（楊時逢 1984），提供相當詳細的描寫，可以作為進一步研究語音演變的根據。

上面的這些介紹只是就大體的情形來說的，在這篇短文裏自然無法把目前的研究一一詳細說明。書目方面有楊福綿（Yang 1981）的詳目，近五年來，《方言》學報刊載許多有關官話的論文，都是值得參考的。以下將就一些個人注意到的跟官話方言有關的問題提出來討論。

貳、分區問題

方言分區究竟應該用什麼樣的條件？哪一類的條件最重要？在兩個條件發生抵觸的時候，應該以哪一條作為分合的根據？幾年以前，針對這些問題，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丁 1982）試著提出解答。我的原則是：

「以漢語語音史為根據，用早期歷史性的條件區別大方言；用晚期歷史性的條件區別次方言；用現在平面性的條件區別小方言。早期、晚期是相對的名詞。不一定能確指其時間。條件之輕重以相對之先後為序，最早期的條件最重要，最晚期的條件也就是平面性的語音差異了。」（丁 1982：258）

到現在，我覺得這一個提議似乎仍然有存在的價值。如果不計保存古音特例的方言島，按照這個原則來區分漢語方言的話，可能具有比較堅強的理論根據。

在把漢語分為官話、吳語、湘語、贛語、客家話、閩語和粵語等七大方言之後，對於官話的次方言，我曾經用兩種條件分為五支：

普 通 條 件	北方官話	晉 語	下江官話	西南官話	楚 語
1. 古入聲的演變	入派三聲， 或派入二聲	保持入聲， 或有？尾	保持入聲， 有？尾	入聲歸陽 平或去聲	保持入聲， 無塞音尾
2. 古泥來母的分混	大 致 都 分		大 致 相 混		洪音混， 細音分
獨 特 條 件	北方官話	晉 語	下江官話	西南官話	楚 語
3. 鼻音韻尾有弱化 消失現象	—	+	—	—	—
4. 古魚虞韻知章見 系的字韻母讀 ɿ	—	—	—	—	+

其中晉語和楚語都獨立出來作為官話次方言的一支，和下江官話、西南官話等平行，理由不再贅引。

最近看到李榮（1985a：2-3）提議把「晉語」從北方官話分出來，作為大方言的一支，和湘語、贛語等平行，晉語的定義是「指山西省及其毗連地區有入聲的方言」。

李氏在文中並沒有提到其他的條件，如果只以這一個條件來劃分晉語，似乎不夠堅強。一般說來，下江官話基本上也是有入聲的方言，有的地方還有兩種入聲，但是我們並不把下江官話獨立為一支大方言。李氏自己給官話方言分區，分成西南、中原、北方、蘭銀、北京、膠遼、江淮等七個次方言，其中江淮官話就相當於一般所說的下江官話，其特性正是「古入聲今讀入聲」。我認為把晉語仍舊作為官話的一支來看待，也許比較合適。我在以前的文章裏曾經提出比較詳細的討論。（丁 1982：263-264）。

李氏把官話分為七區，只用了一個條件，就是中古入聲字演變的方向。例如北方官話是古清音入聲今讀陰平，次濁入聲今讀去聲，全濁入聲今讀陽平；而膠遼官話和北方官話的不同只有一點，就是古清音入聲今讀上聲，其餘都一樣。入聲的演變是一個重要的條件，但是僅此一項，又分得如此之細，也許難以說定。是否還有其他聲母、韻母方面的異同可以作為佐證呢？又如西南官話，李氏認定的特性是「古入聲今全讀陽平」，但我們知道四川的第三區古入聲今讀去聲，並且第二區有的方言點入聲還獨立。（詳見楊時逢 1984：1759-1760）。這些地方我們仍然得要承認它們是西南官話。

如上文所說，我把官話分作五支。在晉語、楚語之下沒有再分小方言，對於北方官話、下江官話和西南官話曾經作過進一步的區分。⁶ 現在分述如下：

北方官話分為六區，表列如下：

條 件	國 語	東 北	關 中	西 北	普 北	魯 東
尖團音的區分	不 分				分	
ts : tʂ 的區分	ts : tʂ	ts	ts : tʂ : t̚(pf)		ts : tʂ	ts : tʂ : tʃ
ən : əŋ 的區分	ən : əŋ		ẽ : əŋ	不分，讀 əŋ 或 ẽ	ən : əŋ	ẽ : əŋ (en : eŋ)

關中指以咸陽、西安為代表的小方言；西北指以蘭州為代表的小方言；普北則指一般普通北方官話。原來進行初步觀察的時候，設定的條件多至十幾條，例如：（1）

6 關於晉語部份，橋本萬太郎 1976-77 分為晉北、晉中、晉南三支。

腦：禩的區分，(2) $n:1$ 洪音的讀法，(3) $n:1$ 細音的讀法，(4) 國語 $z-$ 的讀法；(5) $n、1$ 能否配撮口音，(6) 「絲生詩扇」四字的區分，(7) $in:in$ 的區分，(8) 調類多少，(9) 調值高低等等。經過比較淘汰，最後選定的這三個條件都是相當晚期或平面性的現象，合於上文所說的原則。

下江官話分爲四區，表列如下：

條 件	京 話	蘇 中	濱 海	皖 南
$ts:ts$ 的 區 分	分	不 分		
$z:1$ 的 區 分	$z:1$	1	$z:1$	
入 聲 調 類	1		2	1
陰 陽 去 的 區 分	不 分		分	

京話指南京官話；蘇中指以揚州、鹽城爲代表的江蘇中部官話；濱海指以泰州、如皋爲代表的江蘇境內比較靠海的官話；皖南指以績溪爲代表的安徽南部方言。觀察過的條件包括：(1) $n:1$ 的分混，(2) 聲母 η 的有無，(3) $ts、ts'、s$ 能否配齊齒韻，(4) $an:an$ 的區分，(5) $\text{ən}:\text{ə}\eta$ 的區分，(6) 「渴：客」的區分，(7) 「街、鞋」的韻母，(8) 調值等等。其中有的條件和表上的條件意義一致，例如：聲母 $\eta-$ 在京話和蘇中都沒有，而在濱海和皖南兩個小方言中都存在。其作用和陰陽去的區分情形類似，因此就略去不提。

容易引起爭論的是皖南的問題。以績溪和江蘇的南通來比較，相同的條件非常多例如： $ts:ts$ 不分；都有 $\eta-$ ； $ts、ts'、s$ 不配齊齒韻； $an:an$ 分讀爲 $\tilde{a}:\tilde{o}$ ； $\text{ən}:\text{ə}\eta$ 不分；「渴：客」不同； $z:1$ 不等；都分陰陽去等等。不同的條件只有績溪不分 $n:1$ ，而南通可分；績溪有一種入聲，而南通有兩種。把分析的角度放大一點， $n:1$ 分混就是中古泥母來母是否合流的問題，那是下江官話、西南官話共同的現象，只能說「大致相混」。入聲的多少也是濱海、皖南之間部分搭界的問題。因此，我暫時把皖南方言歸入下江官話。是否要獨立一支皖方言的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西南官話也分爲四區，表列如下：

條 件	普通西南	兩 湖	上 江	滇 話
tsu : tɕu 的分混	tsu	tɕy	tsu	tsu : tɕu
「杜、助」韻母的讀法	u	ou	u	
入聲調的有無	無		有	無

普通西南官話指四川第一區、第四區，雲南第四區等地的方言；⁷ 兩湖官話指湖北第一區⁸ 及湖南境內跟湖北、貴州交界地區的方言；上江官話指四川第二、第三兩區而言；滇語則指雲南的一、二、三區。觀察過的條件包括：(1) 尖團音的區分，(2) n:l 的區分，(3) f:x 的區分，(4) 「書、虛」的讀法，(5) ən:əŋ 的區分，(6) an:aŋ 的區分，(7) 「代、倍、例、世」的韻母，(8) 齊齒音和撮口音的分混，(9) 調類多少，(10) 調值高低，(11) 入聲的歸屬等等。

以上三個表裏的條件有的還可以省去，例如北方官話中「尖團音的區分」、下江官話中「陰陽去的區分」、西南官話中「杜助韻母的讀法」，剩下的條件已經足夠加以區別。現在仍然保留的原因是為了盡可能照顧聲韻調的全面性，或者為了條件的特殊性。區分次方言和小方言的工作有時是難以說定的，而且總有例外的現象存在。趙元任先生 (1948: 1567) 以顏色的界限來比喻方言的分界，實在是不易之論。目前我的看法只能說是一種工作過程中的假設而已。

叁、聲母演變的現象

官話聲母的演變有許多值得研究的問題，例如：中古全濁塞音和塞擦音聲母在官話中演變的方向一致嗎？如果不一致，何時合流？在其他方言中有無特殊的現象？這一類的問題都有許多學者做過研究，例如王力 (1958)、張琨 (Chang 1971)、Hashimoto (1978) 對語音的發展或各方言中的情況都有一般性的探討；鄭再發 (1966) 考察過十七項音變的「錐頂」；鄭錦全 (1980) 深入探索過北音顎化的源流，並指出語

7 這裏所用的第一區、第四區等名稱是引用楊時逢 1969、1984 中的分區。

8 湖北第一區是用趙元任等 1948 中的分區。

音變遷的相互關係。至於如何解釋音變，則有王士元的理論。(Wang 1969, Cheng and Wang 1971)。本文只預備提出幾個現象來加以討論。

一、全濁塞音和塞擦音的演變

以前閱讀有關客家話的文獻的時候，常常思考一個問題，客家話既然確實是從陝西、山西、河南三省之間遷徙南來，何以現在北方官話各小方言都沒有全濁塞音平仄全變送氣清音的現象？直到龔煌城(1981: 47-56)利用西夏文資料指出十二世紀西北方音中有一種方言正是全濁塞音變為送氣清音的時候，才打破疑團。這種演變除贛方言和客家話以外，張琨(Chang 1975b: 641-642)早已指出在安徽、江蘇都有相同的現象，但在北方官話中只找到不完整的記錄，如靈寶(楊時逢等 1971)。其實在唐代的漢藏對音資料中已經顯示有這一種方言，可惜解釋的方向有一點偏差，未能得到正確的評斷。現在把歷史文獻中所顯示的全濁塞音(包括濁塞擦音，下同)演變的類型作一個綜合的觀察：

(一) 全濁塞音不分平仄都變為送氣清塞音(次清)

羅常培先生(1933: 29)研究《大乘中宗見解》的漢藏對音，發現除去「凡梵，怠道第大地盜定達，著」等十一個字保存濁音以外，其餘全濁塞音和塞擦音的字都變成次清。由於保存濁音的十一個字中有兩個上聲，六個去聲，又由於《大乘中宗見解》和《千字文》(簡稱「大」、「千」)之中有部分全清上去聲字和全濁相混的現象，羅先生的解釋是：「可見全濁平聲變次清、仄聲變全清的趨勢那時候已竟開始了。」我們要注意，保存濁音的有一個平聲字「凡」，同時變為次清的字四聲都有，例如：

平：p'- 菩盤平，t'- 同檀，c'- 持塵，ts'- 財慈前情曾，k'- 其。

上：ts'- 在造聚。

去：p'- 鼻，c'- 治住，ts'- 自淨，k'- 具共。

入：p'- 拔別帛，t'- 獨毒，c'- 值，ts'- 集絕寂，k'- 及。

如果認為在這個方言裏全濁塞音變次清，也就是變送氣清音是大的趨勢，而未變的十一個字是詞彙擴散的遺留，或方言參雜的現象，也許更切合實際。至於有些全清的字

藏文對音用全濁音來代替，可能是不同性質的問題，羅先生已有解釋。值得注意的是同一個字而藏音有清濁兩讀，如：本：pon（千）：bun（大）；對：twa'i（千）：dwe（大）；眾：cuñ（大）：juñ（大）；作：tsag（大）：dzag（大）；解：ka（千）：ga（大）；舉：ku'u（千）：gu（大）；故：ko（大）：gu（千）；觀：kwan（大）：gwan（大）。很可能是對音值的分辨不夠精確而引起的。

《大乘中宗見解》的對音屬於八至九世紀，《千字文》也屬於九世紀。我們可以說，在八九世紀時，西北地區有一種方音全濁塞音和塞擦音已變為送氣清音，只有少數例外。這個解釋如果正確，那麼這是最早的「全濁變次清」的記載。

龔煌城（1981）研究《番漢合時掌中珠》（1190）一書裏的漢夏對音，發現大量的材料顯示下列現象：

西夏對音：	ph	th	kh	tsh
	∧	∧	∧	∧
漢語方音：	ph b	th d	kh g	tsh dz

他的結論是：「從對音資料觀察，中古漢語的濁塞音與濁塞擦音，不分聲調，均變成送氣的清塞音與清塞擦音。」這是堅不可移的論斷。

如果對漢藏對音的資料還有不敢盡信的地方，至少這一項十二世紀的材料毫無問題。在北方官話的歷史上找到這個現象，使我們對於客家話的來源和部分下江官話的現象得到語音上的證據。

（二）全濁塞音不分平仄都變為不送氣清塞音（全清）

羅常培先生（1933：75-94）研究《開蒙要訓》（929）中的漢字注音，發現有「幫並互注、端定互注、照澄互注、精從互注、見羣互注」等許多例子，因此斷定中古的全濁塞音已經變為不送氣的清音。他說：「如果當時注音者不至於十分隨便，我們只能承認牠是這種方音的特異色彩。」《開蒙要訓》代表的是十世紀的敦煌方音，為什麼羅先生措辭如此謹慎，可能因為在今天的北方方言中沒有發現全濁塞音都變全清的例子。事實上晉語和北方官話中已有同樣的演變，只是隱藏在另一個語言層裏，未曾受到應有的注意。

王立達（1958a：29）指出太原方言裏中古全濁「並、定、從、澄、羣」等五母和平聲字在文言音中讀送氣，但是在白話音中都讀為不送氣清音。例如：

排 pæ = 白；調 tiəu = 刁，提 ti = 低，甜 tiɛ = 顛，田 tiɛ = 顛，桃 tɕu = 刀；

前 tɕiɛ = 煎；厨 tsu = 朱，遲 tsɿ = 知；騎 ɕit = 機。

這些字都是平聲，讀同一個低平調，⁹ 原文並附有每一個字在白話音中出現的詞語。李守秀（1980），侯精一（1980）指出山西中部榆次、平遙方言有類似的現象；錢曾怡（1981）更說明山東文登、榮成、牟平一帶五十六個方言都有全濁塞音平聲今讀不送氣清音的情形，約有五十個字，如盆、蹄、錢、纏、騎等字白話音聲母都讀不送氣清音。晉語全濁塞音聲母的演變一般來說是跟北方官話一樣的，平聲變送氣，仄聲變不送氣。現在晉魯地區部分白話音也變不送氣，豈不是「全濁變全清」，跟《開蒙要訓》的情形一樣了嗎？

肯定這個類型之後，讓我們想起元代八思巴字給漢語注音所引起的難題。（詳見 Hashimoto 1978:80-92）。簡單說來，以舌尖音為例，情形是這樣的：

漢 語	八思巴文
全清 t	 d
次清 t'	 t'
全濁 d	 t

清濁對當，正好相反。最近鄭再發（1985:48）採取 Hashimoto 引用服部四郎（1946）的意見，認為當時漢語的全濁塞音已經清化，而在韻書裏仍然人為性的保留著，因此對這一套已經清化的全濁塞音自然要用清塞音來代替了。這個解釋大體上沒有困難，但問題是，如果濁音清化的方向如服部等人所說，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明明分為兩種，又已經與全清、次清合流，而八思巴文只用一種清音來表示，似乎理由不夠充分。現在知道有這種「全濁變全清」的現象，仍以舌尖音為例，我們可以假設從 d- 變 t- 的過程中，和丹陽城內的吳語（趙元任 1928:22-26）一樣，有一個 ɖ- 作為過渡音，那麼八思巴文的辦法，以不送氣清音來代替從全濁音變來的另一種清音，就很合適了：

9 太原話是保持入聲的，但「白」字文言音讀成平聲。平聲不分陰陽，都是低平調。

漢語	八思巴文
全清 t	 d
次清 t'	 t'
全濁 d	 t

t、d 都是不送氣的清音，前者較硬，後者較軟。（見趙 1928:18）。從蒙古語的角度來看，蒙語和漢語各有三套音，以 t'- 代漢語的 t'-，毫無問題；在其餘的兩種清音中作一選擇，可能覺得濁音 d- 比較接近漢語較硬的 t-，自然以蒙語的 t- 對漢語的 d 了。

（三）全濁塞音清化，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

這種演變是目前絕大部分官話區的共同現象，目前所見文獻中最早的紀錄是邵雍（1011-1077）所作的《皇極經世》書中的聲音倡和圖，據周祖謨（1943）的研究，十一世紀汴洛一帶的方言全濁塞音已經清化，並按平仄分為送氣和不送氣兩種清音。陸志韋（1946b）、李榮（1956）的看法都一致。到十四世紀《中原音韻》和十五世紀的《韻略易通》（1442）《中原雅音》（1398-1460）都有相同的系統。¹⁰ 奇怪的是韓國資料裏，全濁塞音保存在《翻譯老乞大、翻譯朴通事》十五世紀的左側音裏，到十六世紀的右側音裏才完全清化，並按平仄分讀。可見濁塞音清化的步調在不同的方言中前後頗不一致。（參見康 1985:193-194）。

以上這三種全濁塞音和塞擦音演變的類型，以第三種類型力量最強，因此在官話方言區中成為最普遍的演變。也因此使得另外的兩種類型只保存在白話層裏，隱藏在文言層之下不易發現。上文提到的太原的白話音是「全濁變全清」的系統，如皋的白話音（丁 1966）就是「全濁變次清」的系統。

二、見系（k-、k'-...）和精系（ts-、ts'-...）的顎化及其相關問題

（一）顎化音產生的時代

鄭錦全（1980）對北音顎化的源流做過相當徹底的研究。他認為精系字的顎化受細音 i、y 的影響，而止攝的精系字卻沒有顎化，「茲慈絲」等字聲母並不讀 tɕ-、

10 關於《中原雅音》一書的研究，詳見邵榮芬 1981。

tɕ'-, ɕ'-, 這一類「支思韻」的形成必然早於顎化的發生。¹¹ 同時他指出：「明清兩代的韻書，爲了切音的方便，也常因韻母的開合洪細而用不同的字代表同一個聲母。對見曉精系字來說，字母細分常使人弄不清到底是聲母本身的不同還是介音的不同。」因此，他一一檢討其他研究中提出來的證據的可靠性，結論是：「北方音系見曉精系字顎化大約全面形成於十六、七世紀。到了十八世紀前半葉，《圓音正考》(1743)對尖團音的分析，正表示顎化已經完成。」¹²

韓國方面的資料只能看出見系字顎化的現象，因爲在他們的拼音文字中只有一套表示舌尖塞擦音及擦音的符號。爲了記錄漢語的精系字和照系字，特別改爲兩套，但仍然無法記錄從 ts- 到 tɕ'- 的變化。¹³ 據姜信沆 (1980) 的研究，在十七世紀《老乞大諺解、朴通事諺解》兩書中，完全沒有反映顎化的現象，但到十八世紀《朴通事新釋諺解》(1765) 中就有下列的現象：

tɕi：飢計鷄既幾給	ki：已紀吉極及寄
tɕ'iao：橋	k'iao：巧
ɕi：喜	xi：稀

可見在十八世紀中葉，北方方言的見系字確實有顯著的顎化現象，和上文所說《圓音正考》的情形完全符合。只是這種顎化音形成的上限不得早過十七世紀的中葉，跟鄭錦全的結論有出入。但是語音演變實際發生的年代總是早於見於著錄的年代。鄭氏根據趙蔭棠 (1936：91) 研究明隆慶間 (1570 左右) 雲南人本悟禪師所著《韻略易通》所得的推論還是可以採信的。另一個問題就是見系顎化和精系顎化的時代是否相同，目前文獻上還沒有足夠的證據來加以判別。方言研究上，何大安 (1985) 對西南官話中雲南方言顎化音的演變有深入的觀察，他認爲見系字的顎化音早於精系字。(詳見

11 「支思韻」產生的時間，大概不會晚過十二世紀，最著名的資料是《切韻指掌圖》，把本來韻鏡排在四等的「茲雌慈思詞」等字改排在一等，據董同龢先師的考證，指掌圖作成的時代不會晚於孫奕作「示兒編」序的年代 (1205)。關於支思韻的形成，詳見薛鳳生 (1980)。

12 參見王力 1958：124 註 2。

13 韓文通常以「ㄸ ㅌ ㅍ」表示 ts、ts'、s。在《洪武正韻譯訓》裏，改用左脚長的「ㄸ ㅌ ㅍ」表示齒頭音，右脚長的「ㄸ ㅌ ㅍ」表示正齒音。如果齒頭音是 ts、ts'、s，正齒音是 tʃ、tʃ'、ʃ，那麼顎化的 tɕ、tɕ'、ɕ 仍舊無法表示。

下文)。

(二) 官話方言中跟顎化音有關的現象

見系字 $k-$ 、 $k'-$ 、 $x-$ 在客家話、閩語、粵語中一般沒有顎化的現象，在吳語、湘語、贛語中，出現在前高元音之前時通常都顎化。在官話方言中大體顎化，只有山東福山、棲霞、牟平等地仍讀舌根音。山東榮成雖然沒有顎化，但在齊齒音和撮口音之前卻讀成 $c-$ 、 $c'-$ 、 $\varsigma-$ ，正代表走向舌面音的中途站。(見陳舜政 1974: 53)。

最近，張衛東(1984)指出文登、榮成的白話音有一個特別的現象，就是部分見系字文言音讀 $k-$ 、 $k'-$ 、 $x-$ ，而白話音卻讀 $ts-$ 、 $ts'-$ 、 $s-$ 。例如：肩：kian (文)：tsian (白)，牽：k'ian (文)：ts'ian (白)，瞎：xia (文)：sia (白) 加上一些方志上的材料，他反對顎化說，認為近代北方官話區有一些方言早就有這種見系字文白異讀的現象。事實上，這個看法並沒有能解決根本的問題：自古以來，見系字都是舌根音，文登、榮成白話音中的舌尖音又是怎麼演變來的呢？是從 $k-$ 、 $k'-$ 、 $x-$ 直接變為 $ts-$ 、 $ts'-$ 、 $s-$ 嗎？或者經過別的階段呢？我們暫且先看雲南的現象。

何大安(1985)研究雲南省一百個縣中與顎化有關聲母的演變，他發現也有顎化音再舌尖化的例子。例如，在晉寧方言中：

見系 精系 語 音

江 = 將 : tɕian

缺 = 切 : tɕ'ie

許 = 洗 : ɕi

同時又有這樣的現象：

今 = 津 : tsĩ

輕 = 清 : ts'ĩ

欣 = 新 : sĩ

合理的解釋是見精兩系都顎化，然後在 i 韻之前又變為舌尖音。用規律來寫，就是：

1. $*k-$ 、 $*k'-$ 、 $*x-$ → $tɕ-$ 、 $tɕ'-$ 、 $\varsigma-$

2. $*ts-$ 、 $*ts'-$ 、 $*s-$ → $tɕ-$ 、 $tɕ'-$ 、 $\varsigma-$

3. $tɕ-$ 、 $tɕ'-$ 、 $\varsigma-$ → $ts-$ 、 $ts'-$ 、 $s-$ / ĩ

這個分析相信是正確的。由此推論，那麼文登、榮成的見精文白兩讀的現象可能由兩個語言層組成：文言音中見系字保存舌根音；白話音中的見系字已經經過顎化的階段變為舌尖音了。這個推論是從西南官話看北方官話，如能從北方官話中全面研究顎化音的演變，就更能得到令人信服的結論了。在上面的規律中，怎麼知道 $k-$ 、 $k'-$ 、 $x-$ 的顎化在先呢？何大安分析說：

「所有的百縣方言 $*k$ 系顎化都已完成，但 $*ts$ 系字有些方言尚未顎化，如牟定、麗江；有的剛開始顎化，如蘭坪；有的顎化已接近完成，如鹽豐；有的已完成顎化，如昆明等大多數方言。」

這些方言點顎化的條件都可以用語音規律來說明。除去見系和精系的字以外，捲舌音的字也有經過舌尖音的階段走上顎化的。

以一般的印象而言，在官話方言之中，見系的顎化遠較精系為普遍，也許見系的演變比較早。部分捲舌音的顎化相信是較為後起的現象。錢曾怡等（1984）發現山東諸城有端系字在今音齊齒呼之前讀舌面音 t 、 t' 和 $t\zeta$ 、 $t\zeta'$ 的情形，則是少見而有局限性的演變。

三、其他聲母的演變概況

對方言中一般性的聲母演變以及聲母與韻母、聲調關係的研究，王力（1958）的《漢語史稿》是一部重要的著作，近來張琨先生也有好幾篇提綱挈領的文章。（見 Chang 1971, 1975，張琨 1982。）以下提出來的幾點是我覺得有新材料可以補正的地方，簡略地作一個說明。

唇音分化為重唇音和輕唇音的現象，羅常培先生（1931:254-255）指出唐末（-907）守溫的三十字母中雖然沒有輕唇音，但由於敦煌寫本守溫韻學殘卷「辨聲韻相似而歸處不同例」中所舉都是「非敷」兩母的字，同時「歸三十字母例」中輕唇四字單列一行，可見當時輕唇音和重唇音其實已有分別。更早一點，在八九世紀的漢藏對音（羅 1933:16）裏，「非敷奉」和「滂」母合流，也已露出分化的痕跡。宋代汴洛語音（周祖謨 1943:637）和十二世紀西夏對音（龔 1981:66）均已清楚顯示「非敷奉」合流了。微母在西夏對音中已經失去鼻音成分，和喻母合口、影疑兩母合口一等字合

流爲 w-。

奉母變 f，牽涉中古全部濁擦音清化的時代，漢藏對音中「禪邪匣」分別變入清母「審心曉」，西夏對音完全一致，因此我們知道濁擦音清化的時代比濁塞音和濁塞擦音的清化時代略早，在西北方音中，大約八、九世紀即已完成。

知系、照二系、照三系在官話中大致合流，步調頗不相同，又牽涉龍宇純 (1981) 指出的切韻時代照二照三可能爲一套聲母的問題，周法高先生 (Chou 1983) 維持兩套的看法，Pulleyblank (1984) 認爲切韻是兩套，到早期韻圖變爲一套。我想另文檢討，在這裏不詳細說明。

鼻音聲母的演變在歷史文獻上似乎有過鼻音加同部位濁塞音的階段，漢藏對音、西夏對音分別用 b-、m- 和 d-、n- 兩套聲母對譯漢語的 m-、n-，但是只用 g- 對譯 ŋ-。可能因條件不同 m- 有 mb-、n- 有 nd- 的讀法。在西夏對音裏，顯明的條件大致是韻母，陽聲韻聲母保持 m-、n-，入聲韻聲母變爲 mb-、nd-。今天山西西部平陽、文水等地的鼻音加濁塞音聲母也許就是一種遺跡。Matthew Chen (1973:53) 曾經假設 n- 演變的過程中經過 n~nd 的階段，在這裏得到歷史文獻的支持。邵雍的聲音倡和圖以鼻音聲母的上聲字爲清，平去入聲爲濁，是以聲調爲條件，周祖謨的解釋認爲上聲調的鼻音可能濁音成分少。

日母的演變大致是由鼻音產生同部位的濁擦音，在官話中大部分變 ʒ 或 l，小部分讀舌尖鼻音 n-，如漢口；或改讀 l-，如揚州；或變零聲母，如瀋陽、膠東。關於「二兒耳」等字的讀法，朝鮮資料 (姜 1980:527) 有下列的記載：

翻譯老乞大、翻譯朴通事	1517前	二兒耳	ʒʌ
老乞大諺解	1670	二 ʒil	兒耳 ʒʌl
朴通事諺解	1677	二 'il	兒耳 'ʌl
朴通事新釋諺解	1765	二兒耳	'il
華音啟蒙諺解	1883	二兒耳	'əl

似乎在十七世紀時這幾個字受聲母的影響產生一個韻尾，然後聲母就消失了。王力 (1958:129) 元音和輔音對調位置的解釋，ʒl → lʒ → əɿ，恐怕不大可靠。

喻母、影母合流爲零聲母的時間相當早，邵雍的聲音倡和圖和西夏對音都顯示相

同的演變。大致是開口變 j-，合口變 w-。

肆、韻尾的合併、消失與產生

對漢語韻尾演變的研究有好幾篇分量很重的論文：陳淵泉（Chen 1973）提出塞音尾和鼻音尾平行發展的說法，並推測演變的方向。張琨先生（1983）專門討論漢語方言中吳語和官話鼻音韻尾消失的情形，一般說來，最容易產生鼻化作用的是低元音後面的舌尖鼻音 an，在官話方言中 *en 鼻化的可能性佔第二位，最保守不易產生變化的是後高元音後面的舌根鼻音 oŋ。Exic Zee（1985）最近提出鼻音韻尾演變的新看法，跟陳淵泉的說法不同，陳氏認為 -m、-n、-ŋ 先變為 -m、-ŋ 或 -n、-ŋ，最後合併為 -ŋ，再產生元音鼻化作用，韻尾消失。Zee 認為主要的方向是 -m > -n 和 -ŋ > -n，-n 尾更容易產生鼻化作用。我覺得漢語方言材料豐富，各大方言的演變未必相同，觀察大的趨勢自然很重要，但如何判斷大的趨勢，如何決定那一種演變更有普遍性，恐怕不能以少數個別的方言點為根據，而要以各大方言為單位來討論。張琨先生的材料吳語包括三十七個方言點，官話包括一百一十九個方言點，才具有說服力。¹⁴ 例如 Norman（1980）指出閩語永安方言有十一個鼻化韻母，七個保留鼻音韻尾的韻母，而這七個韻母的鼻音韻尾都是 -m。從歷史音韻的角度來看，-am、-em、-iam、-iem 的 -m 都是從 -ŋ 來的，-ǔm、-ǔm 是從 -ŋ 和 -n 來的，-ĩm 只有兩個字，保存 -m 尾。鼻化韻母部分則從 -m、-n、-ŋ 來的都有。究竟閩語的韻尾演變情形如何呢？永安方言可能是一個特例，但是只以漢語方音字匯的材料為根據是不夠的。以下就官話方言中材料豐富的部分來說明鼻音韻尾的合併，並從特殊的例子分析一部分消失和產生新韻尾的情形：

一、鼻音韻尾的合併

官話方言鼻音韻尾的合併方向，跟中古音比較起來，最大的趨勢就是 -m 變 -n，這一點是大家公認的。從歷史音韻的材料來看，周祖謨（1964：656-662）研究宋代方

14 張先生的材料中有湘語部分，因此文中所說的鼻音韻尾的演變並不以吳語和官話為限。

音，指出當時荆楚地區有「以南爲難，荆爲巾」的記載，已經顯示有 -m 變 -n 和 -ŋ 變 -n 的現象。更早的痕跡如漢代和魏晉秦隴地區的詩人常有侵 (-m) 真 (-n) 兩部押韻的例子（見羅、周 1958: 99, Ting 1975: 265），只是不敢完全肯定是 -m 變 -n 的現象，因爲還有別的可能的解釋。

在現代方言中，西南官話部分如四川、雲南、湖北各省都有相當完整的報告，張琨先生（1983）已經利用雲南、湖北的資料作過分析。現在以四川的材料來說明鼻音韻尾合併的狀況。

在四川方言一百三十四縣（楊時逢 1984）之中，有鼻化韻母的共有二十六縣。其中屬於第一區的八縣，第二區的十四縣，第三區的一縣，第四區的三縣。先以沒有鼻化韻母的成都和儀隴爲例，有下列幾類鼻音韻母：

成都	一	二	三	四	儀隴	一	二	三	四
	an	ən	aŋ	oŋ		an	ən	aŋ	oŋ
	ien	in	iaŋ	ioŋ		ian	in	iaŋ	ioŋ
	uan	uən	uaŋ			uan	uən	uaŋ	
	yen	yin				yan	yin		

從整個四川的官話來說，這樣的陽聲韻母系統是全面性的。可以看出中古的 -m 尾都變成 -n，同時部分 -ŋ 尾也變成了 -n，例如：沉 = 陳 = 成，讀 ts'ən，金 = 巾 = 京，讀 tɕin。產生鼻化韻的地方，可以分爲兩個類型：

1. 只有第一類韻母發生變化：

ã, iã, uã, yã：如松潘。

ã, iẽ, uã, yẽ：如蓬溪、灌縣、井研、三臺等十一處。

æ̃, iẽ, uæ̃, yẽ：如峨邊等二處。

ã, iẽ, uã, yẽ：如南江、南部等七處。

ã, ie, uã, ye：如峨眉。

鼻化的過程有兩種可能，一種是以儀隴的 an、ian、uan、yan 爲出發點，an → ã，然後 ã → ẽ/i、y__。另一種可能是以成都的 an、ien、uan、yen 爲出發點，an → ã，

en → ě。當然成都原來也是從儀隴一類的音系變來的。不同點是 -n 尾消失、鼻化元音產生時，前者的條件爲 a 元音，後者爲 a、e。最後到峨眉鼻音消失的情形則是一致的：ě → e。

2. 一、三兩類韻母都發生變化，部分合併：

ã、iã、uã、iě、yě：如酉陽、馬邊等三處。

ã、iã、uã、iě、yě：如長寧。

這一類型把 an、aŋ 兩類韻母合併爲鼻化的一類。如從儀隴的音系出發，可能是有 -n 尾的先產生鼻化元音之後，-ŋ 尾的後來才加入，否則不會有 iě、iě 和 iã 的對比。如果 -n、-ŋ 同時消失，那麼原來的 ian 和 iaŋ 應該合流。以先後規則來寫，應該如下：

(1) an → ã

(2) ã → ě 或 ě/i、y__

(3) aŋ → ã

如果以成都音系爲出發點，那麼規則就不同了：

(1) an → ã

(2) en → ě

(3) aŋ → ã

這三條規則可以有先後，也可以同時發生。從整個的趨勢看來，以前一種分析可能性較大，後面這一種缺乏系統性的變化。

以上這兩種類型的鼻音韻尾的變化，可以看出三點：第一、產生鼻化元音時，an 和 aŋ 並不先合併；第二、演變的先後受元音的影響很大，低元音 a 之後的舌尖鼻音 -n 先產生鼻化作用，其次是低元音 a 之後舌根鼻音 -ŋ。而 ən、oŋ 都不大變化，只有一點值得特別說明的，就是在酉陽，沒有 -uən 韻母，「門、坤、溫」一類的字完全變成 oŋ 韻了，很可能是 uə 先變 o，然後再影響 -n 變 -ŋ；第三、ě 的鼻化作用首先消失。

這裏分析的結果跟張琨先生（1983）指出的結論有何不同呢？主要的一點是鼻化

作用次快的是 aŋ 韻母，而不是 ən 韻母。¹⁵ 以雲南方言一百零一縣的情形檢看一遍，按照 an、ən、aŋ、oŋ 四類來統計，可以得到下列的數字：

完全不產生鼻化作用的	20
an 類韻母鼻化的	11
an、ən 類韻母鼻化的	42
an、ən、aŋ 類韻母鼻化的	23
四類都產生鼻化作用的	3
鼻音韻母全部變成舒聲的	2

只有 an 類有十一處單獨發生變化，同時沒有一個方言點是 an、aŋ 產生鼻化而 ən 不變的，可以證實張先生所說的理論：an 最前進，ən 其次，oŋ 最保守。但是雲南、四川兩地的步調卻不相同。按照上文所作的次方言分區，雲南一、二、三區是滇語，四川一、四兩區是普通西南官話，四川二、三兩區是上江官話，也還不能代表整個的西南官話。如果一個大方言羣中只舉少數幾處為例，可能會忽略演變的真相。

二、鼻音韻尾的消失

鼻音韻尾從引起元音鼻化到完全消失，軌跡並不相同。最簡單的如 an → ā → a，比較複雜的演變就值得特別注意，也許可以作為我們擬測古音的參考。

雲南的鼻音韻母和四川的類別非常相似，大致可分四類：

一	二	三	四
an	ən	aŋ	oŋ
iən	in	iaŋ	
uan	uən	uaŋ	ioŋ
yən	yn		

這是雲南鹽津的實際情形，如果把第一類的元音全改為 a。第二類的 in、yn 改為 iən、

15 這裏的 -ən 相當於張先生文中所說的 *en。最近甄尙靈（1983）有一篇專門討論四川方言鼻音韻尾的文章，以《四川方言音系》（1960）為根據，演變情形略有不同。

yən 就更整齊了。說是音位的系統，或者是最接近古雲南話的系統都言之成理。沒有撮口音的地方，yn 就變為 in。其中第二類的韻母有下列鼻化的情形：¹⁶

鹽津	洱源	景東	彌渡	蒙化	例	字
ən	əĩ	ɛĩ	eĩ	ei	門真根，等增恆，冷正耕，沈壬	
in	ĩ	ĩ	ĩ	ĩ	賓鄰斤，冰陵興，兵丁京，稟侵	
uən	uəĩ	ueĩ	ueĩ	uē	頓尊昏	
yn	yĩ			yĩ	羣雲	

需要說明的有五點：第一，-n 引起元音鼻化的同時，本身還變成 ĩ；第二，-in 鼻化後只有一個 ĩ；第三，在蒙化，eĩ 進一步變為 ei；第四，-n 變 ĩ 的現象發生在偏前的元音之後；第五，也是最值得重視的一點，就是從例字看來，顯然有下列韻尾演變的現象：

-m、-n、-ŋ → -n → -ĩ → -i

例字分爲四類的，分別屬於中古的臻攝、曾攝、梗攝和深攝。

這個現象使我們想起中古梗攝字的韻尾問題，Hashimoto (1978-79) 擬測一個舌面鼻音的韻尾 -ɲ，來解釋梗攝字的演變。Pulleyblank (1984) 改用 -jŋ。現在我們看到雲南方言中「臻曾梗深」四攝的韻尾經過 -n 的階段，都變 -ĩ，一部分再變為 -i，條件可能是偏前的元音。那麼梗攝字會不會也因為主要元音偏前，韻尾經過 -n 再變為日本漢音的 -i 呢？至少這是一個可能。

雲南的證據也許太單薄，我們再來看看別的類似的現象：

劉勛寧 (1983) 記錄陝北清澗方言的白話音，有下列情形（聲調省去）：

山攝開口三等：戰顛 tɕei，纏蟬禪 tɕ'ei，善扇 ɕei。

咸攝開口三等：站粘 tɕei，陝閃 ɕei，染冉 ʐei。

梗攝開口三等：正 tɕei，聲 ɕei。

田希誠等 (1983) 記錄山西臨猗的白話音，也有下列現象：

16 此一資料見楊 1969，原來的記音者是董同龢先師（洱源），丁聲樹先生（鹽津、景東、彌度、蒙化）。

曾攝開口一等：疼 t'ei，層 ts'ei。

曾攝開口三等：蒸 tɕei，蠅 iei。

清潤方言的鼻音韻尾或許也經過合併的階段再變為 -i 的，臨猗則只有曾攝字變 -i。可見變 -i 的現象並非梗攝字所獨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兩處的韻尾變 -i 都產生在 e 元音之後。梅縣客家話梗、曾兩攝的字在元音 i、e、ə 之後韻尾也變為 -n 和 -t。¹⁷

如果我們給中古的梗攝字擬測比較偏前偏高的元音，能否解釋後來的變化呢？如果梗攝字的韻尾也和雲南一樣，經過 -n 的階段，也許可以解釋何以梗攝有些字的讀音在方言中韻尾變 -n。那麼，Hashimoto 擬測的 -ɲ 尾恐怕不是必要的。¹⁸

另外，在雲南方言中也有下列現象：

鹽津	賓川	鳳儀	例	字
oŋ	oũ	ou/p___; u	朋風夢（鳳儀讀 -ou）；東中空（鳳儀讀 -u）	
ioŋ	ioũ	yu	胸用	

-ŋ 在 o 元音之後先變 ũ，再失去鼻音變 -u。可見 -i 和 -n，-u 和 -ŋ 在音韻上確有關聯，國語只有這四種韻尾。因此我們覺得以辨音徵性 (distinctive feature) 來分析的話，頗能把握這些韻尾的一般性：

徵	性	i	n	u	ŋ
響亮音 (sonorant)		+	+	+	+
後音 (back)		-	-	+	+

塞音韻尾 -p、-t、-k 在官話中大致都消失，在保存入聲的地方通常合併為喉塞音尾 -ʔ，現在略去不談。

三、鼻音韻尾的產生

官話中有些方言把中古的陰聲字讀成陽聲，等於產生一個新的鼻音韻尾，大致可以分為三種類型來看：

17 見袁家驊 1960: 165。

18 周法高先生 (Chou 1983: 177-178) 也不贊成用舌面鼻音尾的辦法，但是他提出的理由和我的不同。

第一、受雙唇鼻音聲母影響而產生的 -ŋ 韻尾

湖北（趙元任等 1948）武昌、漢口、漢陽、京山、荊門等地「木、目」兩字讀 mon 陽平調，漢川、沔陽、天門等地也讀 mon，但爲入聲。有的地方則讀爲 muŋ，如鍾祥，同時「畝母」也讀 muŋ 上聲。這類字字數很少，但變讀相當一致，相信是受到聲母鼻音的影響。雲南（楊時逢 1969）也有類似的現象，例如蘭坪讀 mon 的字陽平有「木、目」，上聲有「某、畝」，去聲有「帽貌」。這些字中古的來源不同，「木、目」是通攝入聲字，「某、畝」是流攝上聲字，「帽貌」是效攝去聲字。在湖北西南官話區，不讀爲陽聲韻時，「木、目、母」讀 mu，其餘各字都讀 mau。共同的特點是以「u」爲主要元音或韻尾，如上所說，「u」和「ŋ」都是部位偏後的響亮音，加上雙唇鼻音聲母的影響，產生新的韻尾 -ŋ，造成目前的現象。¹⁹

第二、中古流攝字韻尾變爲鼻化音

雲南賓川 oũ 韻有「某否豆頭漏走醜手狗侯藕」等字，ioũ 韻有「繆牛流酒秋袖右」等字，在雲南全省是惟一的例子。例字都是中古流攝字，一般滇語都讀 -əu，-əʊ，少數地方讀 -əuɪ，-ou。變讀鼻化元音的理由看不出來，只能肯定流攝字有這樣的變化。

第三、中古山、臻、曾、梗、通等攝合口字韻尾變 -m

潘家懿（1982）指出晉中祁縣有這種現象，-m 尾共有兩個韻母，-om 和 -iom。大致山、臻、曾、梗一二等合口、三等文韻唇音字和通攝合口三等大部分字在 -om 韻，臻、梗三四等合口和通攝合口三等小部分舌根音的字讀 -iom。我想可能是韻尾 -n、-ŋ 合併之後，各攝元音受介音的影響變成圓唇後元音，然後韻尾再變爲 -m，材料不全，只能作一猜測。

第四、其他零碎現象

下江官話中，江蘇鹽城有部分果攝字讀 ɔ，如「哥婆多拖羅河」。西南官話中，雲南洱源把其他鄰近方言的 -a 讀爲 -ã，大部分是假攝字。如「巴怕大他拿茶沙」等字的韻母是 -ã，「家假蝦下牙」等字是 -iã，「抓瓜花瓦」等字是 -uã。

19 李國正（1984）分析四川話流攝字讀鼻音尾的情形，因爲沒有看到通攝的「木、目」和效攝的「帽、貌」所以看法不同。

雲南彌渡蟹攝止攝的部分合口字讀 $eĩ$ ，如「悲培梅飛」等唇音字的韻母是 $-eĩ$ ，「對推雷嘴隨追垂水蕊桂虧灰危」等字的韻母是 $-ueĩ$ 。

以上這些比較零散的現象雖然知道大致的範圍，但產生的原因還有待解釋。

伍、聲調的分合與擬測

官話方言的聲調一直是研究者有興趣的課題，白滌洲（1943）調查陝西各地的聲調，Giet（1937, 1939）記錄山東西南部的單字調和連讀變調，可說是早期的研究。近年來有兩個重要的問題引起廣泛的注意：

第一是聲調的演變。從中古到現在的官話，究竟是由分而合呢？還是由合而分？換句話說，中古平上去入四聲究竟包含幾個調？如果四聲只是四調，那麼演變的軌跡就是由少變多；如果四聲根本有八個調，那麼後來的調類就是由分而合了。杜其容（1976）、王士元（Wang 1983）分別從歷史文獻和聲調演變的角度提出四聲八調之說，認為中古的四聲各按聲母之清濁分爲兩調，實際上共有八調。這個說法有人贊成，如潘悟雲（1982）；而我個人則持相反的看法，認為中古四聲還是只有四調，後來的演變都是由少變多，在某些方言中再有進一步的省併。這個問題不僅牽涉到官話方言，其他漢語方言都在討論之列，因此我另外寫成「漢語聲調的演變」一文，在此不詳細討論，只提出官話方言中的晉語作一點說明。

根據王立達（1958b）的報告，晉語的聲調有下列的情形：

中古音		太 原	平 遙	五 臺	包 頭
平	清	平	平	平	陰 平
	濁				陽 平
上	清	上	上	上	上
	次濁				
	全濁	去	去	去	去
去	清				
	濁				

入	清	陰 入	陰 入	入	入
	次濁				
	全濁	陽 入	陽 入		

這個表顯示好幾點特色：1. 濁上歸去；2. 太原、平遙兩地平、去各爲一調，包頭去、入各爲一調；3. 次濁對入聲的演變有影響，在太原歸陰入，在平遙歸陽入；4. 五臺的平上去入幾乎與中古的四聲全同。根據這些特色，我們所知道清、濁的區別對聲調的演變而言太簡略了，次濁的路向與全濁並不相同。從五臺的情形看來，除去「濁上歸去」這一點代表相當早期的演變以外，²⁰ 要說這四個調是從七個或八個調兩兩合併而來，可能有解釋上的困難。尤其當我們知道漢語的聲調自上古以來，從押韻的格式證明一直是四個調，要說四變爲八，再合而爲四，恐怕不是令人信服的說法。同時上文曾經指出太原、榆次的白話層，全濁塞音變爲不送氣清音，入聲又保存一至兩種，在在顯示晉語的演變和北方官話有相當大的差異，我把晉語視爲跟北方官話平行的一支，那麼，聲調的演變不同於北方官話，可能保存中古之後不久的調類，應該是可以說得通的。其他方言中還有許多別的證明，支持我對聲調演變的看法，在此不贅。（參見丁 1985。）

第二是調值的擬測。在我們知道某一個方言的調類之後，通常都記錄其調值，從方言間調類的比較可以推知古語的調類，那麼從調值的比較，能不能擬測古語的調值呢？首先注意這個問題並從事研究的，是平山久雄（1972、1974、1975）。梅祖麟（Mei 1977）則根據朝鮮資料擬測十六世紀北平話的調值，並討論變調現象，都有可靠的發現。最近，平山（1983、1984）又擬測山東西南方言的古調值、江淮方言和北方方言的祖調值，結論如下：

山東西南方言：陰平 11，陽平 55，上聲 24，去聲 51。

江淮方言：陰平 42，陽平 11，上聲 '435，去聲 35，入聲 x。

20 羅常培（1933: 127）早已指出根據唐李涪「刊誤」批評吳音的話，可以斷定在李氏的方音裏全濁上聲已經跟去聲不分。最近李榮（1985c）的文章更有深入的分析。

北方方言：陰平 42，陽平 11，上聲 '435，陰去 35，陽去 24，陰入 x1，陽入 x2。

我自己 (Ting 1982, 丁1984) 曾經提出「變調即原調」的想法，並進一步在吳語聲調的研究之中得到相當有力的證明。對平山的看法我不完全同意，例如江淮方言中的上聲，他提出緊喉作用「，」的說法，恐怕未必可靠；又如北方官話的七個調，是根據江淮方言的五個調推演而來，並沒有方言上的證據。北方官話中似乎沒有見到分陰陽去的方言。同時，這也牽涉到上文所說的聲調分合的方向問題，這裏無法詳論。

「變調即原調」的說法在北方官話中也可以找到證據，如張盛裕 (1984) 調查的銀川方言單字只有三個調：平、上、去。從歷史音韻的角度來看，上聲包含北平的陽平和上聲，這個區別只在連讀變調時才保存。例如：

鞋 = 海 xɛ 53 鞋帶 xɛ 53 tɛ 13 帶海帶 xɛ 35 tɛ 13

我們如果要推定早期銀川上聲的調值，只有從變調入手。

「變調」的情形有好些種，有前字或後字的變調，受詞彙和文法的限制也有不同，如何進一步釐清「變調即原調」適用的範圍，每一個大方言可能仍有不同之處，還須要繼續研究，何大安 (1984) 已經做了一部分工作。

陸、結 語

本文本來是想把有關官話方言的研究作個概略的描述，並提出一些未解決的問題來討論。但是官話的範圍實在太大，研究的成果實在太多，方言學跟歷史音韻學的關係又密不可分，因此只能就個人特別有興趣的音韻學的範圍作掛一漏萬式的說明。²¹

上文提到的現象或試著解決的問題包括：官話方言的分區；濁塞音聲母演變的三種方向；八思巴文注音中清濁交錯的解釋；見精系字顎化的情形；鼻音韻尾的合併、消失與產生；梗攝字擬測舌面鼻音尾的檢討；聲調的演變和古調值的擬測等。

上文沒有提到的現象或有待解決的問題包括：捲舌音的演變；零聲母的來源；官話方言文白層次的釐清；歷史文獻和方言的配合；各次方言母語之擬測；官話詞彙之

21 關於國語的研究，文中特別沒有提到。因為文獻極多，而在這次的會議裏又另有專文討論，見林燾「Language in Beijing」。

比較；官話特殊語法的描述等。

漢語方言的資料已經不少，但是從研究者來說，仍覺不足。如果每一個地方都有湖北方言調查報告那樣的記錄，許多問題當可迎刃而解。方言中語音演變的實際情形一方面可以作為解釋歷史音變的幫助，另一方面希望提供若干理論，作為對一般語言學的貢獻。因此，路還很長，可做的事正多。

引 用 書 目

簡稱：

BIHP 史語所集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SPIHP 史語所專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

THJCS 《清華學報》。

JCL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

丁邦新（參見 Ting Pang-hsin）

1966 〈如皋方言的音韻〉，《史語所集刊》36：573-633。

1975 〈平仄新考〉，《史語所集刊》47.1：1-15。

1978 《老乞大諺解、朴通事諺解》序，聯經出版公司，臺北。

1981a 〈漢語聲調源於韻尾說之檢討〉，《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文字組，267-283。

1981b 〈與中原音韻相關的幾種方言現象〉，《史語所集刊》52.4：619-650。

1982 〈漢語方言區分的條件，慶祝李方桂先生八十歲論文集〉，《清華學報》新十四卷一・二期：257-273。

1984 〈吳語聲調之研究〉，《史語所集刊》55.4：755-788。

1985 〈漢語聲調的演變〉，《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印刷中）。

王 力

1958 《漢語史稿》上册，科學出版社，北京。

王立達

- 1958a 〈太原方言中的文白異讀現象〉，《中國語文》1958.1：29-30。
1958b 〈山西方音中的聲調與普通話的對應關係〉，《方言與普通話集刊》
5：106-118。

四川大學

- 1960 〈四川方言音系〉，《四川大學學報》1960.3：1-123。

田希誠、呂枕甲

- 1983 〈臨猗方言的文白異讀〉，《中國語文》1983.5：337-343。

平山久雄

- 1972 〈客家桃源方言聲調調値の內的再構〉，《中國の言語と文學》209-228。
1974 〈中國語閩南閩北祖方言の聲調調値〉，《中國哲學論文集》193-248。
1975 〈廈門話古調値的内部構擬〉，JCL 3.1：3-15。
1983 〈山東西南方言的變調及其成因〉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21：59-81。
1984 〈江淮方言祖調値構擬和北方方言祖調値初案〉，《語言研究》6：185-199。

白滌洲

- 1934 〈關中聲調實驗錄〉，《史語所集刊》4.4：447-488。

何大安

- 1984 〈變讀現象的兩種貫時意義—兼論晉江方言的古調値〉，《史語所集刊》
55.1：115-132。
1985 〈雲南漢語方言中與顎化音有關諸聲母的演變〉，《史語所集刊》56.2：
261-284。

杜其容

- 1976 〈中古聲調研究〉，《中華文化復興月刊》9.3：22-30。

李守秀

- 1980 〈榆次方言的文白異讀〉，《中國語文》1980.4：270-271。

丁 邦 新

李國正

- 1984 〈四川話流、蟹兩攝讀鼻音尾字的分析〉，《中國語文》1984.6：441-444。

李 榮

- 1956 《切韻音系》，北京。
1985a 〈官話方言的分區〉，《方言》1985.1：2-5。
1985b 〈漢語方言分區的幾個問題〉，《方言》1985.2：81-88。
1985c 〈論李涪對切韻的批評及其相關問題〉，《中國語文》1985.1：1-9。

周祖謨

- 1943 〈宋代汴洛語音考〉，《輔仁學誌》12：221-285；又見《問學集》581-655。
1966 《問學集》，中華書局，北京。

邵榮芬

- 1981 《中原雅音研究》，人民出版社，山東。

姜信沅

- 1980 〈依據朝鮮資料略記近代漢語語音史〉，《史語所集刊》51.3：525-544。

服部四郎

- 1946 《元朝秘史の蒙古語を表はす漢字の研究》，東京。

侯精一

- 1980 〈平遙方言的連讀變調〉，《方言》1980.1：1-14。

袁家驊

- 1960 《漢語方言概要》，文字改革出版社，北京。

康寔鎮

- 1985 《老乞大、朴通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陳舜政

- 1974 《榮成方言音系》，三人行出版社，臺北。

陸志韋

1946a 〈釋中原音韻〉，《燕京學報》31：35-70。

1946b 〈記邵雍皇極經世的天聲地音〉，《燕京學報》31：71-80。

陸志韋、楊耐思

1981 《中原音韻音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

崔玲愛

1975 《洪武正韻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張琨（參見 Chang Kun）

1982 〈漢語方言聲母韻母之間的關係〉，《史語所集刊》53.1：57-77。

1983 〈漢語方言中鼻音韻尾的消失〉，《史語所集刊》54.1：3-74。

張盛裕

1984 〈銀川方言的聲調〉，《方言》1984.1：19-26。

張衛東

1984 〈文登榮成方言中古見系部分字的文白異讀〉，《語言學論叢》12：36-49。

楊時逢

1969 《雲南方言調查報告》，史語所專刊之五十六。

1984 《四川方言調查報告》，史語所專刊之八十二。

楊時逢、荆允敬

1971 〈靈寶方言〉，《清華學報》新十四卷一、二期：106-147。

詹伯慧

1981a 《現代漢語方言》，人民出版社，湖北。

1981b 〈漢語北方方言的一致性〉，《中國語學》228：29-36。

甄尚靈

1983 〈四川方言的鼻尾韻〉，《方言》1983.4：241-243。

董同龢

1954 《中國語音史》，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臺北。

1968 《漢語音韻學》，廣文書局，臺北。

丁 邦 新

趙元任

1928 〈現代吳語的研究〉，清華學校研究院，北京。

趙元任、丁聲樹、楊時逢、吳宗濟、董同龢

1948 〈湖北方言調查報告〉，史語所專刊之十八。

趙蔭棠

1936 〈中原音韻研究〉，上海。

鄭再發（參見 Cheng Tsai Fa）

1966 〈漢語音韻史的分期問題〉，《史語所集刊》36：635-648。

鄭錦全

1980 〈明清韻書字母的介音與北音顎化源流的探討，董同龢先生紀念專號〉，
《書目季刊》14.2：77-87。

潘悟雲

1982 〈關於漢語聲調發展的幾個問題〉，JCL 10.2：359-385。

潘家懿

1982 〈晉中祁縣方言裏的 m 尾〉，《中國語文》1982.3：221-222。

劉勛寧

1983 〈陝北清澗方言的文白異讀〉，《中國語文》1983.1：40-43。

橋本萬太郎（參見 Hashimoto）

1976-77 〈晉語諸方言の比較研究(1)(2)(3)〉，《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
研究》12：11-58；13：77-127；14：72-132。

錢曾怡

1981 〈文登榮成方言中中古全濁平聲字的讀音〉，《中國語文》1981.4：294-
296。

錢曾怡、羅福騰、曹志贊

1984 〈山東諸城、五蓮方言的聲韻特點〉，《中國語文》1984.3：186-191。

龍宇純

1981 〈論照穿床審四母兩類上字讀音〉，《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會議論文集》

語言文字組 247-265。

薛鳳生

- 1980 〈論《支思韻》的形成與演進〉，董同龢先生紀念專號，《書目季刊》
14.2：53-75。

羅常培

- 1931 〈敦煌寫本守溫韻學殘卷跋〉，《史語所集刊》3.2：251-261。
1933 《唐五代西北方音》，史語所單刊之十二，上海。

羅常培、周祖謨

- 1958 《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第一分冊，北京。

龔煌城

- 1981 〈十二世紀末漢語的西北方音〉，《史語所集刊》52.1：37-78。

Chang Kun (張琨)

- 1971 Phonological Aspects of Chinese Dialectology, *THJCS* New Series
9.1, 2：192-215.
1975 Tonal Developments among Chinese Dialects, *BIHP* 46.4：636-
709.

Chen, Matthew (陳淵泉)

- 1973 Cross-dialectal Comparison: A Case Study and Som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JCL* 1.1：38-63.

Cheng Chin-chuan and Wang, William S-Y. (鄭錦全、王士元)

- 1971 Phonological Change of Middle Chinese Initials, *THJCS* New Series,
9.1, 2：216-270.

Cheng Tsai Fa (鄭再發)

- 1985 *Ancient Chinese and Early Mandarin*, *JCL* Monograph Series, No. 2.

Chou Fa-Kao (周法高)

- 1983 On the Structure of Rime Tables in the Yün-ching 韻鏡，《史語所
集刊》54.1：169-186.

丁 邦 新

Giet, P. Franz

1937 *Die Töne in Süd-shantung, besprochen und dargestellt*. Beiträge zur Einführung ins Chinesische Studium 1, Taikiachuang.

1939 *Die Töne des Süd-shantung Dialekts in Wortverbindungen*. Beiträge zur Einführung ins Chinesische Studium 4, Taikiachuang.

Hashimoto Mantaro (橋本萬太郎)

1978-79 *Phonology of Ancient Chinese*, Stud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Monograph Series, No. 11.

Hsueh Feng-sheng (薛鳳生)

1976 *Phonology of Old Mandarin*, Mouton.

Li Fang Kuei (李方桂)

1973 Languages and Dialects of China, *JCL* 1.1:1-13. 原作 Languages and Dialects, 1937 *Chinese Year Book* 59-65.

Mei Tsu-lin (梅祖麟)

1977 Tones and Tone Sandhi in 16th Century Mandarin. *JCL* 5.2: 237-260.

Norman, Jerry

1980 〈永安方言〉，董同龢先生紀念專號，〈書目季刊〉14.2: 113-165。

Pulleyblank, E. G,

1984 *Middle Chinese, A Study in Historical Phonology*,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Stimson, Hugh

1962 Phonology of the Chung-yüan yin-yün, *THJCS* New Series 3: 114-159.

1966 *The Jongyuan In Yunn: A Guide to Old Mandarin Pronunciation*, New Haven: Far Eastern Publications.

1978 Old Mandarin Dialects, Old Pekingese, and the Rymes of the

Zhongyuan Yinyun, *Proceedings of Symposium on Chinese Linguistics*,
1977 Linguistic Institute of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
Student Book Company.

Ting Pang-hsin (丁邦新)

1975 *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Special Publications 65. Taipei.

1982 Some Aspects of Tonal Development in Chinese Dialects, *BIHP*
53.4 : 629-644.

Wang, William S-Y. (王士元)

1969 Competing Changes as a Cause of Residue, *Language* 45 : 9-25.

1987 A Note on Tone Development, *Wang Li Memorial Volumes*, English
Volume 435-443.

Yang, Paul Fu-mian (楊福綿)

1981 *Chinese Dialectology: A Selected and Classified Bibliograph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Zee, Eric (徐雲揚)

1985 Sound Change in Syllable Final Nasal Consonants in Chinese, *JCL*
13.2 : 291-230.